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六辑

经籍考古 卷四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六辑

经籍考古
卷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重大项目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福清石竹山道院文化建设重大项目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 第六辑, 经籍考古: 共4卷 /
詹石窗总主编.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

ISBN 978 - 7 - 5439 - 7227 - 8

I. ①百… II. ①詹…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0742 号

选题策划: 张 树

责任编辑: 张 树 王倍倍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六辑《经籍考古》

詹石窗 总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39.25 字数 2785000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9 - 7227 - 8

定价: 3080.00 元(全 4 册)

[http:// www. sstlp. com](http://www.sstlp.com)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六辑

经籍考古

卷四

分辑主编◎姜守诚

编校◎姜守诚

刘江



《经籍考古》卷四·道教考古(下)

目 录

道教造像

《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主尊之名考辨	李 淦(3)
从《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看北朝道教造像	丁明夷(6)
从药王山造像碑看道教石刻造像的早期形态	谢建国(17)
略论关中地区道教造像碑的史料价值	张 方(20)
一块北魏羌族的道教造像碑	李 淦(24)
关中一带北朝道教造像的几点基本问题	李 淦(28)
北魏魏文朗造像碑补考	李 淦(45)
陕西北魏道(佛)教造像碑、石类型和形象造型探究	胡文和(52)
论山西太原龙山道教石洞龕	宁俊伟(68)
论太原龙山道教石窟的开凿	刘 江(74)
大足石刻道教造像渊源初探	李远国(82)
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	邓之金(89)
关于四川道教摩崖造像中的一些问题	
——与王家祐先生商榷	胡文和(100)
剑阁出土的道教神像及其价值	母学勇(109)
剑阁鹤鸣山石刻道教图谱的内涵初论	母学勇(116)
剑阁县的道教摩崖造像	蔡运生(121)
试谈四川的道教石刻	吴觉非(124)
四川剑阁鹤鸣山道教摩崖造像	曾德仁 李 良 金普军(131)
四川道教石窟造像	胡文和 曾德仁(139)
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考述	李 强(161)
《老子铭》考释	韩秉方(166)
老子母碑考论	刘 屹(172)
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道教人物考	信立祥(180)

略论黔北宋墓的道教雕刻	张合荣(189)
唐太清宫道教造像源流考略	张晓雄(197)
道像造型中的莲台及其他	石衍丰(203)
中国西部古代道教石刻造像研究	黄海德(207)
关于魏文朗佛道造像碑纪年的考释	李 改 李文军(217)
四川省丹棱县龙鹄山道教摩崖造像	曾德仁(220)
从“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	
——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分期研究	李 淦(224)
以长安为中心的早期道教造像	
——中国道教雕塑述略之一	李 淦(237)
四川隋唐道教石刻造像	
——中国道教雕塑述略之五	李 淦(252)

道教碑刻

神化的碑文及新样的造像	
——山西芮城县西魏《蔡洪造太上老君像碑》的识读	李 淦(265)
从泰山石刻看泰山全真教的历史发展	白如祥(273)
从泰山道教石刻看武则天的宗教信仰	王永平(278)
从武当山元代碑刻看道教文化的流变	罗耀松(286)
从新发现的太一道碑刻资料论太一道的衰亡	徐玉立(290)
《大唐龙兴观灯台颂并序》石刻研考	李 森(296)
道教碑刻揭示的浙江道教史	徐雪凡(300)
《酆都罗山拔苦超升镇鬼真形》碑考析	陈行一(309)
河北蔚县玉泉寺至元十七年圣旨碑考略	刘建华(314)
姬志真《创建清梦观记》碑文考	霍建瑜(318)
金台观碑《张三丰遗迹记》考述	张满良(323)
张三丰宝鸡行迹考	
——以金台观所藏明代碑石为中心	姜守诚(326)
洛阳云溪观遗址出土碑铭考述	霍宏伟 刘连香(338)
青州全真修真宫考	赵卫东(346)
陕西蒲城博物馆藏朝武当全会碑探析	胡春涛(356)
唐以前嵩山道教的发展及其遗迹	
——中岳嵩高灵庙之碑	王 卡 尹岚宁(363)
武曌与泰山鸳鸯碑	周 郢(368)
易县龙兴观与道德经幢	张洪印(372)



东汉《肥致碑》考释	虞万里 (377)
东汉肥致碑探索	王育成 (384)
汉肥致碑考疑	王家葵 (393)
论肥致碑的立碑者及碑的性质	刘昭瑞 (398)
金代曹道士碑之调查与初步研究	丹化沙 (402)
金代曹道士碑文勘误及其书法研究	李克民 (409)
唐《昊天观周尊师墓志铭》考释	李举纲 贾梅 (416)

道教考古杂论

三清山的道教宫观建筑特色及其八卦形制浅析	黄上祈 (423)
“东治三师”“三五将军”“大一三府”“南帝三郎”考 ——谈镇江东晋墓所出道教印	刘昭瑞 (429)
蒲江道教“北极驱邪院印”考	龙腾 (437)
四川道教古印与神秘文字	冯广宏 王家祐 (441)
汉阙考	姜生 (446)
四川地区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研究	白彬 (451)
说“天宫”与寇谦之的“静轮天宫”	刘昭瑞 (459)
真武“铁杵磨成针”壁画图像研究	肖海明 (467)
试从考古材料看《女青鬼律》的成书年代和流行地域	白彬 代丽鹃 (474)
武当山五龙宫青龙白虎塑像及其制作年代	沈伟 (491)
北京地区道教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孙勳 (501)
论早期道教遗物摇钱树	鲜明 (507)
成都凤凰山出土《太玄经》摇钱树探讨	张善熙 姜易德 屠世荣 (513)
摇钱树为早期道教遗物说质疑	周克林 (520)
再论早期道教遗物摇钱树	鲜明 (528)
《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考辨	范恩君 (534)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六辑

经籍考古

卷四

道教考古（下）



道教造像

《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主尊之名考辨^{*}

李 淞

《姚伯多造像碑》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道教造像碑，它作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现藏陕西耀县博物馆，和药王山其他石刻一起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的资料已两度发表，第一次是1965年的《考古》杂志，刊有《耀县石刻文字略志》，介绍得很简略^①。第二次是1987年的《考古与文物》杂志，刊有《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碑》一文，介绍得详细一些^②。两次介绍都忽略了——或者说还没有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姚伯多造像碑》的主尊之名，即姚碑到底供奉何神？

《耀县石刻文字略志》在介绍姚碑时，仅摘录了该碑发愿文中一小段核心文字，曰：“太和廿年（496）九月四日，姚伯多、伯龙、定龙兄弟为七祖眷属敬造皇先君文石像一躯。”再无它文^③。这里，姚伯多实际上已经说出了他造的神像的名称，只是我们不熟悉它，需作一番推敲。

《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碑》一文，对该碑介绍得较为详细，并附录了全部发愿词。其文首先对姚碑神像之名进行了推敲，称：

龕正中造“皇先君文”之像。“文”为何人，不可考……姚氏对“皇先君文”之像，备加推崇……文，戴道冠，聃耳长颈，衣着不显。双手置于腹前，作结跏趺坐状……《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仅收姚碑之正面发愿词。其附记中把“皇先君文”说成“正面刻佛像”等语，显系有误。^④

依上之意，姚碑主尊为“皇先君文石像”，进而，为“皇先君文”，即“文”者。果乎？先说识字。北朝碑刻之字，颇多难识，其原因在于随意添加笔画甚至改变字形。此碑所谓“先”字即为一例。为碑文“皇先君文石”五字之中，唯所谓“先”字颇为可疑。按其实际笔画，该字写作“𠂔^⑤”，字体为楷兼隶。大概是因为字形上近似“先”字，两次介绍都读作了“先”（我在一篇文章中也审读不细，未对原碑，沿用此说）^⑥。

* 本文原载《中国道教》1995年第3期，第46-48页。

① 耀生：《耀县石刻文字略志》，《考古》1965年第3期，第134页。

② 韩伟、阴志毅：《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碑》，《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第18页。

③ 耀生：《耀县石刻文字略志》，《考古》1965年第3期，第134页。

④ 韩伟、阴志毅：《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碑》，《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第18页。

⑤ 编者注：原文缺字。

⑥ 李淞：《关中带北朝道教造像的几个基本问题》，载《美术史研究》，岭南美术出版社刊稿。

“𡗗”是何字？我认为是“𡗗”，即“老”。

“老”字在北朝碑刻中通行两种写法，一为“𡗗”，一为“𡗗”。后者“𡗗”字由两字组合而成：老人。《颜氏家训杂纂》云：“先人曰老。”今存北朝碑文字，凡“𡗗”字皆读作老。日本著名汉字书典《角川书道大字典》列举了五块北朝碑文及墓志（即《北魏张猛龙碑》《李壁墓志》《张宁墓志》《东魏王偃墓志》《北齐刘碑等造像》），五例中均将“老”字写作“𡗗”^①。笔者在陕西临潼县博物馆的一块造像碑上，也发现了这个字，即《北魏孝昌三年造像碑》。该碑主龕为道像，持扇，戴道冠，着道袍。主龕右侧刻有字一行，上端已残，其后为“太上𡗗君一躯”，当为“太上老君”无疑。另一例为西安碑林藏《北周谯马仁道教造像碑》，碑文称“敬造石老君像一区”，“老”也是这样的写法。隶书或楷兼隶的书体上，较为随意的手书“人”字常被写作“𡗗”或“𡗗”，捺上再加二笔或三笔。这种写法一直延续至今，被认为是“人”字不规范的一种常用写法，我们都很熟悉，不用多辩。因此，姚碑之“𡗗”字即为“老”字，姚碑主尊应为“皇老君文石像”，而非“先君”。

“皇”者，君主，即太上。《汉书》卷四十四《淮南厉王传》：“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颜师古注：“如淳曰：太上，天子也。”^②鉴于此，“皇老君”即可解为“太上老君”。这和《临潼孝昌三年造像碑》的主尊是一致的。

那么，“文”字又作何解呢？我认为有两种解释可供选择。

其一，它与“释迦文佛”一词有关。释迦牟尼，梵辩证 Sākyamuni，又译释迦文尼，再略为释迦文、释迦、释氏。《太子瑞应本起经》上注曰：“释迦文，天竺语，释迦为能，文为儒，义名能儒。”显然：“释迦牟尼”是更准确的音译。“释迦文”的译法大概是考虑到了“文”与“儒”的内在联系而兼有义译成分的音译词。在南北朝的佛教造像中，常用释迦文佛一词。如梁《普通四年释迦立像龕》云：“弟子康胜发心敬造释迦文石像一躯。”而其他一些造像碑中又常略作“释迦像”一躯。看来，“释迦文像”和“释迦像”是相同的意思，“文”字或为可有可无之字。既然，释迦文像即为释迦像，那么“皇老君文石像”不就是“皇老君石像”吗？道教徒仿照佛教徒的做法，给太上老君的名字添上了一点“文儒”的尾巴。如同“释迦文”之“文”字不必追究一样，“皇老君文”之“文”亦无须追究。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认为更有道理，即“文”字作其本意解。“文”之本意为彩色交错、花纹、纹理。《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易·系辞》下：“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既然“文”由五色成，“文石像”不就是彩绘之石像吗？考姚碑主尊原物，三位主尊坐像与四位胁侍立像均极简陋，主尊之五官轮廓尚能看清，但四肢与躯体非常简略，各以一凸起的圆条状形体表示。就浮雕艺术的造型语言来说，似乎是不能再简单了。考察造像的现状、造像与龕底石质的关系，我们可以相信，原物并不是因为残损而至于如此的。换言之，现存物与原初物不会相差太远。然而，姚氏家族对如此简陋的造像，评价却是出乎意料的高，

① [日] 伏见冲敬编：《书道大字典》，角川书店刊，昭和四十九年，第1781页。

② 《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第566页。

其发愿词对本尊造像赞曰：

营构装饰极工匠之奇雕，隐起形图瓌若真容现于今世，倚错尽穹项之制，修来清颜有若真对。

神像功就，于兹有缘，安所仁理，不垂不偏，其图玉莹，绮绣交连，既建岳峙，与山齐连。

姚氏的评语与实物差距很大，如何理解这一现象？我认为，存在着一个补充环节：彩绘。造像之不足，由绘色补之。1500年后之今日，色彩脱尽，我辈所睹，谅非原色也。

在雕塑上进行彩绘，是中国雕塑史上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做法（古希腊、古埃及亦然），远者如地下之秦汉陶俑，近者如地上之莫高窟泥塑和云冈石刻，均为塑（雕）绘结合。从《姚伯多碑》碑侧的浅浮雕供养人像的凿造情况看，姚碑的工匠完全具有东汉画像石工匠一般的技巧，但在凿造高浮雕（主龕像）时却缺乏相应的经验和技能，他们当然会运用传统的方法，在粗糙的石形上进行彩绘，甚至还可能敷以薄泥后再彩绘（这是北朝部分佛像的做法），以达到“若真容现于今世”的造像要求。这就是彩绘石像——文石像。

因此，我认为，所谓“皇先君文石像”并非一位名叫“文”的“皇先君”像，而是太上老君的彩绘石像，这就是《姚伯多造像碑》的主尊。如果以上推论成立，我们就找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太上老君像（《魏文朗造像碑》虽然年代比姚碑早，但其道像的身份却未明确——参见笔者另文^①）。

还有一例可以侧面支持本文的论点。1958年在陕西彬县出土了一件彩绘石道像，该像高43厘米，道像为坐形，右手执扇，左手已残，头戴道冠，身着双层翻领道袍，腰束带。背后刻有荷花纹头光及火焰纹，两侧各有一花朵，像下方为二马^②。石像通体彩绘，面部为桔色，头发为白色，道袍为蓝色，荷花为红绿二色交替，马为黑色，火焰纹为桔红色。石像背面及两侧均有刻铭，其中有“开皇三年”和“白显景造道像”等字^③。此像的凿造时间为开皇三年（583），距《姚伯多造像碑》不到一百年，彬县位于关中之西，耀县位于关中之北，两地相距也不远。由于历史的原因，《白显景造像》得以保存彩绘，可作为我们认识《姚伯多碑》的参照。或者说，《白显景造像》描上的鲜艳色彩，即应是《姚伯多碑》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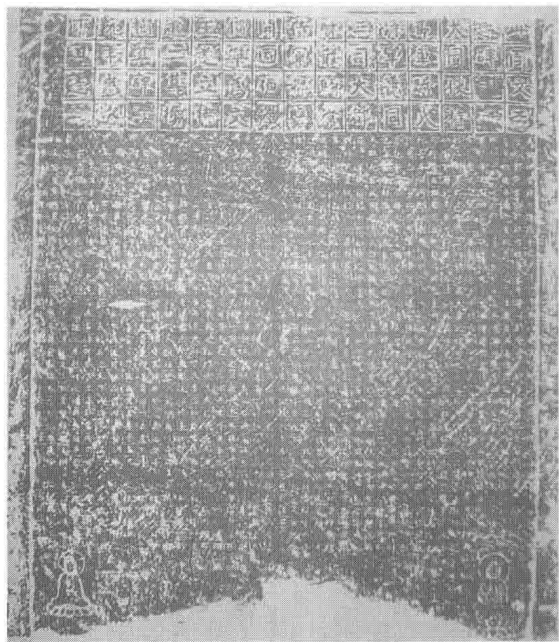
① 李淞：《北魏魏文朗造像碑考补》，《文博》1994年第1期，第52页。

② 笔者曾在一文中将此像中二马误为二驴，见“一块北魏羌族的道教造像碑”。《中国道教》1994年第3期，第32页。

③ 王仁波主编：《汉唐丝绸之路文物精华》，龙出版（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56页。

从《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 看北朝道教造像^{*}

丁明夷



图一 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拓片

《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原石已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曹琦同志有旧藏拓本。碑通高 1.47，宽 1.12 米。碑额十五行，行四字，字径 7 厘米。阳文楷书，题作：“此周文王之碑 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①开国伯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树其碑 元年岁次丁丑造。”碑文凡四十行，行三十四字，字径 2.5×2.8 厘米，共一千三百余字（图一）。

碑早经《舆地纪胜》《舆地碑目》《金石苑》《金石目》《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八琼室金石补正》诸书著录，后一书并收录全文。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称“后周宇文泰纪功碑”，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名之为《强独乐文帝庙造像碑》。现据碑题及碑文内容，命名为《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

碑建于北周开国第一年，即公元 557 年，是有北周纪年最早的一通造像碑。碑中追述宇文泰一生主要功绩，并为他刻造佛道二尊像，这就为研讨西魏、北周历史以及北朝道教造像提供了一件实物资料。前人利用此碑的史料，主要是作史学的阐发，而对碑中透露的有关北朝道教造像的信息，则注意不够。本文拟略于前而详于后，重点研讨北朝道教造像的有关问题。

宇文泰一生，权倾西魏，又缔造了北周王朝，是一个在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称此碑为他

^{*} 本文原载《文物》1986 年第 3 期，第 52—62 页。

^① 军都县，汉置，属上谷郡，在今北京昌平县西。



的纪功碑，并非过言。

碑文洋洋一千三百余言，概述了宇文泰戎马生涯中的五件大事。案之《周书·文帝纪》和《北史》等书，所述大率相合。在某些史实的铺陈上，也间有详略或有无的不同，正可补文献之不足。

1. 起家。宇文泰先世是东胡族宇文部的酋长。北魏以来，世代居代北六镇之一的武川镇。碑文指出，宇文泰“处生成长，值国艰难”（正值北魏末年政治衰乱、佛教泛滥、民不聊生的社会大动荡之时）。这一时期爆发的六镇、河北和关陇三次大起义，与宇文泰后来的崛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宇文泰先是参加，继而又镇压了起义军，所以碑文说：“王有阵敌之功，重勋难彰，除原州刺史……寻转夏州刺史。”

2. 入主关陇。关陇起义军被消灭后，关中地区由贺拔岳与侯莫陈悦两大势力所扼控。宇文泰以世交兼旧部追随贺拔岳并为其左右手，在贺拔岳被害后，又不失时机地收集岳部，举兵诛伐，遂据有关陇地区。对这一段史实，碑文记述较详。特别是写到贺拔岳遭难，军中“人怀异望”之际，宇文泰“星赴平凉”，“誓约六军，泣而言”的大段说词，并引孙武“一人欲死，百人不当；万人欲死，横行天下”的话，以为主帅雪耻作号召，终使“将士同心，扬威西讨”，一举破敌，表现了政治家的胆识和气度。这些较史载尤详。碑中还记载他在入据关陇后，采取了“安置宰守，人民复业”以及“在任清俭”等稳定政治局面的有力措施，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3. 权力顶峰。在宇文泰戎马倥偬的一生中，碑文选择他“威震八极，六合来宾”、权倾西魏的极盛时期，用简练的文字加以颂扬。其中有东、西魏的战争，有西取巴蜀之举，还有“北伐茹茹，倾国归降。南伐梁国，君刑民迁，交广请命。西定宕昌、邓至、吐谷浑，称藩贡献”，都与史载相符。碑、史相证，此其一例。

4. 去世。碑文中记：“昊天不吊，春秋五十，薨于长安。”《周书·文帝纪》记为：“魏恭帝三年（556）……九月，太祖有疾，还至云阳……冬十月乙亥，崩于云阳宫，还长安发丧。时年五十二。甲申，葬于成陵，谥曰文公。”而《北史》卷三十六记作：“时年五十，十二月甲申，葬于成陵。”以碑证之，可知《周书》脱“十”与“月”二字，宇文泰生年五十为是。碑中云“薨于长安”亦误，应为：死于云阳宫，还葬长安。

碑文中叙及北周代西魏立国，宇文泰子宇文觉称周天王，乃“尊谥太上皇”宇文泰，并引“武王灭纣谥先文王”故事，“尊号文王，班告天下”。碑称泰为文王，觉为天王，并书“元年岁次丁丑造”，说明时为宇文觉（孝闵帝）即位之元年，即公元557年。按宇文觉元年正月追尊文公为文王，九月宇文觉即被废杀，宇文毓即位为明帝。明帝武成元年（559）己卯八月，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文皇帝，依此推之，此碑应立于宇文觉元年正月“既临万国”，到九月死去这段时间中。

5. 西蜀建碑缘起。据碑文，强独乐等十二人从宇文贵“边戍岷蜀”，驻防武康郡，听到宇文泰去世的消息，不胜悲切，“故于□东之岭，显益之冈，天落石傍，为王敬造佛二尊宝堂”，并在堂（庙）前立此灵碑。其中，“□东之岭”中的关键一字已泐损，以意度之，似应为“郡”字。因为宇文贵从官中，有武康郡丞刘延，都督、治石尚县傅元绪，都督、治阳安县□于德，都督、治怀远县刘开等四人。武康郡属剑南益州，郡治在阳安，石岗、怀远二县均为郡



辖县。《舆地纪胜·简池志》和《舆地碑目·简州志》均云碑在简州,更云:“后周宇文泰纪功碑在本州界首。”简州,系隋仁寿三年(603)分益、资二州置,治阳安县。上述地点皆在今四川省简阳县境,这也即强独乐等人为宇文泰建“宝堂”与“灵碑”的所在地。

强独乐、夫蒙傁帅、刘延、傅元绪、□于德、刘开等十二人,史俱无传。宇文贵为宇文泰部下大将,《周书》《北史》均有传。碑列其领衔是“柱国大将军、大都督甘州诸军事、化政郡开国公”,其中“大都督甘州诸军事”,则不见于诸传,可补史之阙。至于他奉命“边戍岷蜀”事,《周书》卷十九本传中仅记:“(西魏废帝)三年(554),诏贵代尉迟迥镇蜀。”《北史》卷六十同,皆语焉不详。碑文所记宇文贵等镇蜀设治的史实,也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据碑文,强独乐等人都是“出自布素”,后随宇文泰征战,“蒙王采拔,解褐入朝,位登三司”,成为镇戍武康郡的将吏。从姓氏看,大都督夫蒙傁帅是西羌人,其他则多为汉人。这和《周书·尉迟迥传》所记迥伐蜀时,部从多为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强独乐等人,有此身世遭际,他们对宇文泰“恢身殒命,无以上报”,于是执“臣子”之礼,在驻地为其建造宝堂、灵碑,期以“赞其功德,永序延康”,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该碑下部两侧,分别线刻一尊造像,像通座高20厘米。左侧像铭为“弟子何周敬造释迦像,愿一切法界众生早得作佛”。右侧像铭为“为法界众生敬造”。这两身造像,应即是碑额所题的“佛道二尊像”。左一尊像,已明言是何周造释迦像,佛有肉髻和圆身背光,着双领下垂佛衣,佛衣右襟绕膝上。左手作施无畏印,右手作与愿印,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圆座上。右一尊应为道教像,而袭用佛像的造型:头有肉髻,圆身背光顶端略尖,双领下垂佛衣,衣垂膝蔽手。双手作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单层仰莲圆座上。

至于强独乐等人为宇文泰所建的“佛二尊宝堂”,其造像布局,碑文记曰:“药王在其左^①,普贤在其右,文殊师利挟侍两厢。飞天、化生在上驰翔,师子吒咤在下侏张。百神庄严内外,煌煌鉴察愚冥,济其道场。”这种以普贤、药王菩萨作主像,挟侍文殊菩萨的造像组合,尚不多见。

这两尊佛道像,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北朝佛、道教关系和道教造像的若干信息,因而值得注意。

1. 北朝末年,东、西魏分裂(534-556),继而周、齐对峙(557-577),这一时期中,佛教泛滥愈甚^②。西魏文帝元宝炬、西魏相宇文泰、北周明帝宇文毓和北周相宇文护,都是佞佛之人。西魏文帝与宇文泰,曾于长安立大中兴寺,尊道臻为大统,命昙显造《菩萨藏众经要》等书^③。北周明帝诏造大陟岵、大陟虂二寺^④,并令为先皇造织成像,高二丈六尺,等身

① 药王,即药王菩萨。

②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续高僧传·道臻传》。

④ 《广弘明集》引法琳《辩正论》卷三。



檀像十二躯并诸侍卫^①。

宇文泰平定巴蜀、兼并江陵后，江南僧人入关者渐多，更促进了南北佛教的交流。释亡名“善制作，常慕阮嗣宗（籍）之为人，梁元帝深见礼待，及江陵变乱，西入岷蜀。及周人取蜀，乃至长安。帝王公卿，甚致礼敬”^②。亡名弟子卫元嵩，益州成都人，易俗服入关，上书北周武帝请废佛法。他著有《佛道二论》，封爵蜀郡公^③。还有僧实，“逮周太祖平梁、荆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像至京。以真谛妙宗，备以问实。既而慧心潜运，南北疏通。即为披决，洞出情外，并神而服之”^④。

在这种当权者极力扶掖、南北交流的形势下，不仅是佛教，道教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魏太武帝为寇谦之“于代都东南起坛宇，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帝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⑤。北齐天保五年（554），文宣帝诏问沙汰释、李文中说道：“乃有缁衣之众（佛徒），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道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之不充，王用因兹取乏。”^⑥这就是说，佛、道二教在周、齐之世，已达并驾齐驱、徒侣半天下之势。

在佛、道二教的发展进程中，有融合，也有斗争。极端佞佛的梁武帝萧衍，即位后先曾倚重道教徒陶弘景，“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⑦。而陶弘景虽是道教徒，但在晚年却宣扬自己前生是佛教的胜力菩萨投胎下凡来度众生，并曾往鄮县阿育王塔礼佛，自誓受五大戒。他隐居句容之句曲山（茅山）修炼，随侍者有道士，也有僧侣，死后，“道人（僧侣）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这和强独乐等人所建佛道二尊像，释迦居左、道像居右的情况，竟有异曲同工之趣。他之所以在晚年信奉佛教，自然是为了迎合梁武帝佞佛，同时也是企图融合佛道二教于一身，来发展他的道教，就连后来灭佛的周武帝，也曾天和五年（570）作“二教钟铭”，宣言“二教并兴，双鉴同振”^⑧。西魏宇文泰用苏绰改定官制，设大宗伯职掌沙门道士，属官有司寂掌法门（佛教）之政，司玄掌道门（道教）之政。因此，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在统治阶级看来，其立场和作用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慧远所说“内外之道，可合而明”^⑨，二者完全可以互相配合，共同合作。

中国佛教史上所谓“三武之厄”灭佛事件，头两次发生在北朝，即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其目的主要是抑制佛教的畸形发展，打击僧侣地主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势力，借以巩固政权。所以，就在北周武帝灭佛之初，还曾置通道观，取儒、释、道三方面的代表人物为学士。统治阶级并不想消灭任何一种宗教。隋李士谦论三教优劣，也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在为统治阶级利益运行的轨道上，三教正可以交相辉映，并行不悖。佛、道之争，终归要走向合流，这是必然的趋向。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

①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二十《兴福部》。

② 《续高僧传·亡名传》。

③ 《续高僧传·亡名传》《周书·艺术传》《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④ 《续高僧传·僧实传》。

⑤ 《隋书·经籍志》。

⑥ 《广弘明集》。

⑦ 《南史·隐逸·陶弘景传》。

⑧ 《广弘明集》。

⑨ 《广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

正是这种历史趋向的具体反映。

2. 道教造像出现于何时? 最初的道教造像是什么形象? 这是道教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我们试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两方面加以分析。

道教产生于中国, 渊源于古代的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黄老道, 是早期道教的前身。它受到通俗的民间信仰和儒学、佛教的影响, 并带有较强的民众色彩。早期道教的重要派别, 有东汉顺帝时张陵倡导的五斗米道, 奉老子为教主。东汉灵帝时张角的太平道, 为早期道教另一重要派别。

东汉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祭祀志》记: “桓帝即位十八年, 好神仙事。延熹八年(165), 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 亲祠老子于濯龙。文闕为坛, 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 用郊天乐也。”《后汉书·桓帝纪》也说: “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 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 斯将所谓听于神乎?” 这就说明, 东汉末年如桓帝者所好, 是神仙事。将佛(浮图)与老子并祠, 听命于神意, 是要祈求长生久视的现世利益。早期道教, 是在黄老道的基础上神仙方术的宗教化。这时已有了祭祀老子的宗教仪式, 但还难以证明当时已出现道教造像。相反, 我国早期出现的最早一批佛像, 原与“神仙像”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佛像中杂以道教题材, 是我国佛教遗迹较早的形式与布局。例如, 武梁祠石阙上的“童子”状佛像, 显系“神仙像”脱胎而来。陕西临潼北魏神龟二年(519)四面造像碑, 佛足下博山炉两侧有仙童各一, 供养人行列中, 道民、殫官与邑子、佛弟子并列(《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 《文物》1984年第5期)。酒泉、敦煌出土的北凉石塔中, 佛教造像中杂糅北斗和八卦等道教题材。佛、道交融, 是我国早期造像特点之一。

唐释法琳在其所著《辩正论》卷六自注《十喻九箴》中, 驳李仲卿《十异九迷》, 有如下的说法: “考梁、陈、齐、魏之前, 唯以瓠卢盛经本, 无天尊形像。按任子《道论》及杜氏《幽求》云: ‘道无形质, 盖阴阳之精也。’《陶隐居内传》云: ‘在茅山中, 立佛道二堂, 隔日朝礼。佛堂有像, 道堂无像。’王淳《三教论》云: ‘近世道上, 取活无方, 欲人归信, 乃学佛家制作形像, 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 置之道堂, 以凭衣食。宋陆修静亦为此形。’”玄嶷《甄正论》卷上亦记: “近自吴蜀分疆, 宋齐承统, 别立天尊, 以为教主。”以上是出自佛教徒的记述,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记, 唐高宗时西华观道士郭行真与东明观道士李荣、姚义玄等, 窃取佛经改修道经, 西明寺僧道世上书举发。道士遂舍归正, 造像写经。其发愿文中说: “道本无形, 形之于周魏。佛惟有像, 像布于人天。”这是道士的自身告白, 应较可信。又《隋书·经籍志》记载, 北魏太武帝为寇谦之“于代都东南起坛宇……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

上述记载表明, 早期道教并无造像, 除因其早期发展进程中的具体情况, 还由于受“道无形质”理论的限制。正如《老子想尔注》所言: “道至尊, 隐而微, 无状貌形像也; 但可从其诚, 不可见知也。”但是, 随着佛教造像的兴盛和道教自身的发展, 佛、道之争以西晋惠帝(290-306在位)时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为标志, 也日趋表面化。道教为了求得发展和通俗地宣传教义, “欲人归信”, 也造出了道像。说道士“取活无方”, 固然有佛教徒夸饰、攻讦之嫌, 但道教在生存竞争中为了提高与佛教抗衡的能力, 造出道像, 确也是时势之必然。根据现有文献考察, 最初的道教造像, 大致出现于南北朝初期, 即公元5世纪初宋陆修静